



从门罗书店出发的文学漫游

杨一丹



维多利亚的春天来得迟,海风裹着温柔的潮湿,在石板街的缝隙间踱步。就在这个略显慵懒的星期二午后,我走进了门罗书店——这个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球最美书店”之一的地方。它伫立在加拿大卑诗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府维多利亚市中心的政府街,一栋曾属于加拿大皇家银行的古典建筑之中,高耸的拱拱天花板、彩色玻璃窗与书香相遇交织,仿佛将时间本身沉淀在木头书架之间。

这间书店是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和她的第一任丈夫詹姆斯·门罗于1963年一起创办的。门罗以短篇小说见长,被誉为“加拿大的契诃夫”,三次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于2009年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20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间书店或许见证了她早期的梦想和追求:“开一间全球最棒的书店,一生只写加拿大。”

门罗书店华美的天花板和罗马巨柱处处透露出罗马古典主义的审美遗风,四壁挂着由画家卡罗尔·萨比斯顿绘制、描绘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景观的八幅大型画作——这一设计既是对自然循环的礼赞,也不禁让人联想到爱丽丝·门罗小说中的“日常性”。那种看似平静如水的日子,其实暗流涌动,充满着那些未被大声说出的,但深切存在着的细微生命经验。

门罗曾说:“我所写的,其实就是女孩

和女人们的生活。”她笔下的安大略小镇、沉默的母亲、沉重的亲情与不可言说的性别秩序,总是通过一种“看似琐碎”的文学结构,展现出宏大的存在命题。她的《逃离》《亲爱的生活》《公开的秘密》《快乐影子之舞》《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等代表作,大多发生在加拿大乡村小镇,洞悉与共情着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外表看似平静如水、朴实无华,实则结构精巧,在不经意间掀起命运的惊涛骇浪。门罗的语言并不激进,也不泼辣,但用词一击而中,精当到位,富有张力。她擅长用一种“记忆修辞”的方式,把女性的情感经验缝合在地方性与历史的布景中,让人们在她缓缓的叙事中感受时间一去不返、命运无法捉摸的无力与悲凉。

作为一个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读者,在我来到加拿大学习之前,在深度研读门罗的作品之前,甚至没有想过是否存在真正独立的加拿大文学这件事——它到底是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传统?它与美国文学、英联邦文学,甚至北美文学之间到底应如何界定?这或许不是我一个人的困惑。无法否认,不仅是加拿大文学,加拿大所有的文化产业都在美国的强势遮蔽下面临着不可见的困境。也许正是基于对这一困境的回应,门罗始终坚持写加拿大,门罗书店始终坚持把最佳的陈列空间留给加拿大本土文学。

让世界看到加拿大的本土文学,正是门罗、阿特伍德、翁达杰等作家的毕生追求。尽管长久以来被质疑其独立性,但加拿大文学的确有其独特的文学传统。虽然与美国地理位置毗邻,但不同于美国文学那种崇尚个人英雄主义与建构国家神话的史诗气质,加拿大文学更倾向于低声讲述边缘、断裂与复杂裔文化交织的场域里讲述他们地方性的一部分加拿大作家,不追求英雄硬汉与绝对征服的命题,也拒绝整齐划一的宏大叙事,而是试图在原住民、旧移民、新移民等多元族群文化交织的场域里讲述他们地方性的、艰难而坚强的生存状态;他们从未试图建立神话,而是不断拆解神话,讲述“生存”的状态而非“征服”的姿态。

阅读门罗时,我们进入的正是这样一种去中心化的加拿大叙事,不同于惠特曼、海明威那种宏大、阳刚、自然征服式的美国文学,门罗让我们听见的是炉灶旁的低语,是跨洋信件的缄默,是年老女儿在护理床前的迟疑眼神……这种低声讲述边缘身份和复杂生存经验的叙述姿态,既没有“日不落帝国”文学传统的影子,也与美国文学截然不同,实际上与拉美文学、亚洲文学的传统更为接近,更能够引发共鸣。

不了解加拿大的人,常常会将其与美国相提并论,而加拿大文学的存在,其实也在提醒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历史、经验与感受,

是文化自我认同和精神自治的必要方式。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坚持本土的文学创作,并非是对外部世界的排斥,更不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以真实自我参与世界交流的姿态,是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必要要素,唯有坚守和弘扬自身的语言、记忆与文化,才能与其他文化和文明真正平等对话。也因此,门罗书店对加拿大本土文学的坚持,更像一座守望文化的灯塔,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为人们指引回归精神本源的方向。它不只是售书的空间,更是一个国家如何在文字中辨认自己、讲述自己的象征性场所。

而今,站在门罗生前亲手创办的这间书店里,我忽然感到她小说中那种“地方的灵魂”以一种具体、可感的空间经验包裹住了我。那些她曾描绘的安大略乡镇、沉默的女性、细碎又深刻的生活情感,并未仅仅留存在书页之中,而是以一种凝聚氛围的方式,在这片空间里悄然生长。这不仅是一间书店,更像是一座“精神的庇护所”。在这样的空间中,我得以暂时脱离信息的洪流,静下心来,重新思考文学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微妙关系,获得一段深思与凝视的时光。

或许这正是互联网时代我们仍然需要书店真正意义所在。它不仅是一个售卖纸质书籍的实体,更是保存“深读”与“深感”的少数场域之一——而这些,恰恰是人类精神最隐秘、最缓慢,却也最不可替代的部分。在这个一切都被加速、被优化、被算法预测的时代,门罗书店所给予我的最大触动,并不是它的“美”,而是它所代表的那种“慢”——一种抵抗即时回应、鼓励停顿与共鸣的文化姿态。它仿佛在提醒我们,阅读并不是一种任务,而是一场与另一个灵魂小声交谈的旅程,是我们放下手机、屏住呼吸,蹲下来聆听、思考的少数时刻。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慢”与“真实”的体验正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书籍的装帧、排版,乃至纸张的手感与气味,正在被屏幕、算法与流量机制所取代。门罗书店却依旧坚持举办读书会、邀请本地作家签售、设置儿童阅读专区——这些属于“旧世界”的文化仪式,也许显得脆弱,却因此愈加珍贵。

或许正因它们如此容易被遗忘,才更值得被我们一再记起、用心守护。

方纪(1919—1998)是现当代著名作家,他创作于不同时期的《来访者》(1958)、《挥手之间》(1961)等作品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同时他也是1949年后天津文艺宣传体制的创始人之一。因此对他的研究,既是对一位文艺领导者的经历梳理,历史价值很强;又是对一位作家的创作及其作品接受情况的解读,有文学史价值和以他为中心的思想史价值。长期以来受到资料不足等各方面限制,虽然对方纪的研究有了一些成果,但不够系统化。因此,方大卫、方兆麟合著的《挥手之间的人生:回忆父亲方纪》就填补了关于方纪研究传记方面的空白,为之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部传记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书写了“两个体系”中的方纪。方纪青年时期投身革命运动,抗战时期辗转至延安,参加了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随军到天津接管、领导文艺工作。如果从这一革命体系看,方纪可以定位为具有功勋的天津文艺界领导人。方纪一生笔耕,他最早的作品为报告文学《游击战》,发表于1936年的《今日文学》期刊上;1985年12月,其历年公开发表的大部分作品结集为四卷本《方纪文集》出版,因此他还是一位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这属于文学体系。与方纪有类似经历的文艺领导人与作家也有一些,他们的传记往往是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处理的;但是《挥手之间的人生:回忆父亲方纪》的独创性表现为,把“革命”方纪和“文学”方纪放在不同体系中,将传记分成了两部分,一是侧重革命经历的“挥手之间的人生”,另外是研讨文学创作道路的“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不适用于其他传主,但对于方纪来说是很恰当的。方纪的生涯中有20世纪革命作家特有的光辉和挫折,他们的革命事业与文学工作出自同一个目的,但在此期间却出现了努力工作的成果受到批评的现象——这是一个悖论,方纪的《来访者》遭受不公正的批评就是例子。

传记的革命体系负责讲方纪的生平,文学体系则对方纪的作品作了解读,可谓是对他心灵世界的探索。这使得传主方纪更为丰富和立体,他不再被年谱之类的表述束缚,而是拥有了文学作品带来的深邃、饱满和生气——胜利时刻的欢唱与激情、对小人物的同情、对生活问题的敏锐观察和批判都是体现于文学作品中的。由此,这部传记建构了方纪将一生奉献给革命事业的革命者形象,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一位有人性温度的作家形象。

为此,该传记在叙述传主时,采取了先宏观考察“体系”,再把方纪置于其中的方式。如写方纪在延安时,先是运用大量史料介绍了时代背景、延安革命知识分子的情况,然后再描述身在其中的方纪,并作了与他人的对比。这样就使方纪不是个体的存在,而是被书写进群像之中。由此他的追求、工作等问题就客观呈现了出来,历史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同样,方纪对当代天津文艺宣传领域的贡献,也是在对当时背景的翔实书写中得以生动展现。对文学体系中的方纪,传记一方面作出基于自身理解的梳理,一方面借用同时代人(如孙犁等)的评价和目前学者的研究,尺度明确。传记中两个体系并置的结构在此表现出了互动的特点,它们既是相互独立的板块,又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这正是目前处理方纪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生平、创作之间复杂关系的较为妥当的方式。

本书提供了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使方纪的信息比以前丰富了许多,也为研究“方纪周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于一部传记来说,材料问题是基本的,本不用特意强调,但对于方纪研究来说则是不可忽视的。作家研究的深入程度与材料的充分性有很大关系。方纪亲身经历了现当代尤其是“十七年”时期文艺现场的诸多大事件,有的事件和人物因为历史评价问题目前较难处理,因此写他的传记时不可随意发挥,要参照各种权威版本。故而这部传记在采信材料的时候很慎重,经过严格甄别,有时候宁可付之阙如、留待以后补充也不随意使用未经确定的内容,这就使作品具有很强的可信度。方纪在“十七年”时期领导和参与的一些文艺事件就是这样处理的。这与作者的写作态度有很大关系,因为方兆麟是研究文史方面的专家,对于学术规范非常了解,能在行文中做到很大程度的恪守。由于两位作者均为方纪哲嗣,难免会让人觉得里面会有“为尊者讳”的成分,但因为传记严格遵循了“用史料说话”的学术规范,把“述而不论”作为写作的原则,故而呈现出的方纪是最大限度还原的、未做加工的原貌。

由此可见,《挥手之间的人生:回忆父亲方纪》是一部完成了多项任务的著作,它不仅从史料的角度描绘和还原了方纪的生平,还通过细节让读者感受到他对革命事业的真诚,从而加深了对方纪的认识。

还原出真实丰富的方纪

——评《挥手之间的人生:回忆父亲方纪》

刘卫东





徽章上的天津文化(三)

登临天塔览芳华

罗丹

沽上丛话

说起一座城市,人们常会首先联想起它的地标性建筑。区别于一般建筑,作为城市名片的地标性建筑常坐落于城市核心区,建筑本体形象高大显著且极富特色,具备城市交通及人文地理标志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将本地地标建筑作为历史文化符号融入纪念章设计,作为游客参观、打卡的互动凭证,增强了旅行的参与感和留念感。在“地标”建筑一词兴起的20世纪90年代,天津广播电视塔(简称“天塔”)是将广播电视、城市景观、旅游观光融为一体的重点建设工程,当之无愧地成为天津知名的地标建筑之一。天塔的迅速崛起,以及天塔纪念章的公开发售,对于提升天津城市认知形象、展现城市文化品位和建筑艺术审美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广播电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播电视塔作为信号传输的载体在世界各国不断涌现。其前身是装有信号传输装置的电线杆,一般设立在地形开阔的高地上,属于纯功能性构筑物。最早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广播电视塔,当数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德国斯图加特电视塔。它的建筑蓝本源于混凝土烟囱结构,在包含钢架天线塔的应有功能的基础上,增添了观光游览和餐饮娱乐等额外功能。于收藏市场可以见到的广播电视塔纪念章,如国外的日本东京广播电视塔,国内的陕西广播电视塔、湖北广播电视塔、江苏南京广播电视塔、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黑龙江广播电视塔、辽宁广播电视塔等发行的纪念章看,皆能体现广播电视塔的这种基本功能和经营模式。

天津广播电视塔选址在气象台路、紫金山路、卫津南路形成的以水面为主的三角地带,地势开阔,且地理位置在市区内也较为核心,这不仅有利于信号覆盖,便利的交通也是其成为旅游景点的重要因素。天塔于1988年开工建设,1991年竣工,塔高415.2米,其高度当时在世界上市仅次于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和俄罗斯奥斯坦金诺电视塔,为亚洲之最。天塔是世界各国电视塔中著名的“水中之塔”,是最早加入世界高塔协会的中国成员,天塔湖风景区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天塔旋云”是“津门十景”之一。从收藏市场看,天津广播电视塔纪念章和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纪念章的品种也是最多的。

天塔纪念章皆以天塔建筑为主要图案,根据表现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天塔早期参观纪念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枚以锦盒包装的大铜章。一面为高大挺拔的天塔主体建筑,下方铸有水波纹代表天塔湖,偏上方铸有云纹寓意“天塔旋云”,环绕天塔铸有几圈大小不同的圆线表示发射信号。天塔高耸入云,信号覆盖范围较大,可以为较远的滨海新区城区提供优质信号。时至今日,天塔仍承担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及车载电视等无线广播和地面电视的信号传输工作。此外,造型独特而体量巨大的超高层建筑自然会成为城市景观的视觉焦点。作为基座和背景的天塔湖,也与天塔共同构成独特的城市人文景观,湖光塔影,相映生辉。这枚大铜章的另一面铸有李瑞环同志题写的楷书“天塔”二字,题写时间是1991年9月。因天塔是当年10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的,由此可见它是天塔建成初期发行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纪念章。圆章边缘铸有篆书“天津广播电视塔参观留念”字样,以及其英文名称缩写“TRTVT”,便于海内外游客识别。

更多的一类是天塔开放后陆续发行的参观纪念章。这些纪念章大多为金属材质,主图为金色的天塔形象,底色以红色居多,表面采用滴胶工艺,加上一层透明的保护树脂,增强了图案的立体感和耐磨度。纪念章的形状有圆形、圆边三角形及多种异形,其中金色圆边三角形是天塔景区的标志。

天塔建成后便以彩灯装置绽放异彩,引得市民仰望,成为津门夜景之一。近年来,天塔多次成功展示主题灯光秀,令广大市民叹为“炫酷”。借鉴以往天塔纪念章的设计经验,多推出一些体现城市文化内涵的天塔文创品,当更为市民和游客所期待。题图为1991年发行的天津广播电视塔参观纪念章。

哎,老了老了,没嘛奔头了!常常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这样感叹。

是啊,当我步入老年行列时,也有过这样的伤感。回想那些日子,我甚至不敢照镜子。望

变老是一件新鲜事

武宝生

着稀疏而逐渐发白的头发,凝视着逐渐增多变深的皱纹,抚摸开始发皱松弛的皮肤,确有余晖落尽暮晚霞的感觉。

可是,似乎在一夜之间,我骤然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新人!那天早上,我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顿觉浑身一阵轻松。是啊,老了好多!我,终于成为我自己,完完全全可以无忧无虑地为自己活着了。

于是,我将身心做了一番新调整,备好简易行装,开始周游世界,先国内,后国外。有重点地一处一处观光旅游,先后到过十几个国家。

旅居美国期间,洛杉矶、大峡谷、死亡谷、五大湖、夏威夷、基韦斯特等地都留下了我的脚印。退休后这些年我还重新拾起笔,相继在报刊上发表游记、人生随笔等300多篇。

如今,我已83岁。总体来看,精神不错,身体尚好。我体会,变老是一件新鲜的事。这种心态,让我从年龄链的低谷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天天无忧无虑地“萌新”。从不为年龄问题而纠结。是啊,何必纠结?不必纠结。纠结完全是自作自受,自寻烦恼。因为,退休后没有大的烦恼和忧伤,每一个日子都是新的。变老,虽然少了青春的容颜,却有了一颗明净淡然的心。变老,光阴归已有,自由了,清闲了,睿智了。不汲汲于功名利禄,免除了戚戚之忧,故胸怀坦荡,心静如水。

天若有情,天也终须老。老年人,心要静,身要动。跳出旧窝窝,开创新高度,活出新水平。不扰于外,不困于心。

冰是睡着的水。夕阳是晚开的花。这朵花,依然清新光艳、芬芳扑鼻!



天津美术学院的前身为始建于1906年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是中国颇具影响力的集绘画、工美、艺研为一体的美术院校。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大学,如何与所在的城市建立起更紧密、更具时代感的互动关系?2023年底,天津首个以高等艺术院校为核心,深度融合开放街区的城市更新项目——“天美艺术街区”(以下简称“街区”)正式开街,陆续对外开放,成为海河之畔又一文化新名片。

街区位于河北区李公祠大街与中山路交口西侧。西接天津漕运文化的发祥地三岔河口,东邻中山路,与始建于清朝顺治年间的大悲院近在咫尺,其在片区已发展成为天津文商旅资源要素高度集聚的商圈。

前些年,随着电商的发展,人们的消费场景更多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传统商圈面临挑战——有产品无品牌、有消费无体验、有设施无时尚,片区的发展该如何破局?街区规划设计团队认为,老城区的更新,除了改善在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之外,更需要秉承着眼城市发展的大局观,为城市创造活力,不能单纯地停留在空间和设施的翻新上,而是要重构新的场景,以新场景促进新流量,持续激发城市新活力。

我们首先做的是打开围墙,营造开放的艺术场景。通过对美院建筑功能现状的评估和研判,最终确定打开三马路沿线的校区围墙,面向社会开放。这是颇具历史性的一刻,百年名校在这一刻真正融入了城市。

开放的美院校区现状多为一层砖混结构建筑,功能以美术教室和大师工作室为主。在统筹保护城市空间尺度和美院产业培育、外溢的双重要求下,对部分无保留或保护价值的建筑进行拆除重建,在不破坏原有空间肌理的基础上增加1至2层建筑;首层增加美院相关的业态和文化体验功能,塑造与城市良好互动的文化体验界面;原

大师工作室、艺术教室等功能挪至二层和三层,在增加美院教学面积的同时,强化建筑的公共参与属性。改造后,原美院内部校园路变成了城市艺术走廊,融入城市慢行体系,让所有人都可以重新认识、了解并融入美院,为天津美院的艺术渗透构建了空间、文化和气质上的通道。

接下来就是在街区内重构复合的文化场景。在项目

蝶变新生的城市空间(五)

重构场景下的天美艺术街区



张娜 王及

设计之初,我们就协助天津美院优化老校区结构,确定了“生活向北,文化向南”的发展方向。开放壁画系、雕塑系和石膏馆等教学设施,搭建充满互动性、艺术感的体验场景,打造一个开放式的艺术校园;依托美院现有的美术馆、教师作品双年展、毕业展等平台,建设一批艺术大师工作室、大学生众创空间;打破传统艺术教育场域边界,将美院课堂延伸至红砖巷陌,学生们以街区为画布开展“在地艺术创作”,用装置艺术激活闲置角落,装点斑驳墙面,让艺术从封闭的展厅走向开放的日常,使街区成为流动的艺术实验室。

在校区融合的基础上,“海河青年艺术节”和首届“海河公共艺术节”相继拉开帷幕。通过“开放校园”预约制吸引

游客深度体验美院的创作生态,在一年一度的毕业季,美院学生的毕业作品有了展示的新舞台。在街区展示中心,美院不同院系的学生作品展持续开展,还举办了AI(人工智能)科技艺术作品展、创意素描课题展、天真之美童诗会、天美年味等活动,让街区成为“好看”又“好玩”的文化社交型目的地。

秉承融入城市、服务社会的理念,项目将周边5个老旧小区共计7万余平方米、一千余户居民的生活区纳入街区的提升范围,先后完善市政配套基础设施11项、公共活动空间6项,提升小区管理机制5项。

在补足完善老旧小区短板的同时,广泛征求小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引导他们参与街区设计和社区营造,既提升了大家的生活品质,又为街区注入鲜活的城市文化样本,实现“老社区”向“新艺坊”的蜕变。让市民在工作生活之余得到艺术疗愈和精神的放松,这是社会美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街区构建起“1+N”的全域美育矩阵:融合“天美夜校”美育教育,以核心艺术馆为引领,配套街头长廊、户外装置、微展厅等,形成多层次体验空间。随着艺术文化与城市生活的融合渗透,片区资源进一步被激活,形成“文化街区、居住社区、城市景区、艺术校区”联动发展的活力样态。

天美艺术街区的打造,不单单是一次物业翻新,更是永续进行且以人为核心的场景重构,还是一场天津美院与城市烟火的双向奔赴。截至2025年底,街区已组织开展活动和展览80余场,累计来客数量约25万人次,市民和游客在殿堂级的学院欣赏艺术,在烟火气的街区体验艺术与美学,规划设计团队设想中的愿景正在逐步实现。

(张娜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市更新院院长,正高级工程师;王及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